

论丝路视域下中亚东干族诗歌的书写价值



<https://doi.org/10.5281/zenodo.7335909>

兰州大学文学院

刘晋汝

摘要：中亚东干族是前苏联 150 多个民族中一个少数民族(由中国清代陕甘回族移民后裔群体所形成)。现主要生活在今天的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及乌兹别克斯坦。人口 10 万多。从 1877 年(清光绪三年)移居中亚至今，虽然只有 120 多年历史，却拥有丰富多彩、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和民族诗歌。作为丝绸之路沿线地区的重要文类，中亚东干族诗歌自然可被纳入“丝路文学”范畴，本文以此为切入点论述其书写意义与价值。

关键词：中亚东干族；诗歌；书写价值

随着“一带一路”概念的提出，“丝路文学”作为丝路文化研究一个十分重要的范畴应运而生，一般来说这一概念至少有两种含义：一是指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文学，二是指题材涉及丝绸之路的文学。目前大多研究者所使用的丝路文学概念是将二者合而为一，既指有关丝绸之路题材的作品，也指丝绸之路这一地缘空间中产生的文学现象与作家作品。改革开放 30 年以来，在民族伟大复兴的背景下，丝绸之路作为一条开放之路与和平之路，世界性视野下多国家、多民族、多地区的文学特色应是其题中应有之义。因此，中亚东干族诗歌作为“丝路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蕴含着深厚的“丝路文化”价值，主要表现为：传统民歌价值、家园寻根价值和即时性流变价值。本文拟就以上三个方面，对中亚东干族诗歌创作中的“丝路文化”价值进行分析。

一、传统文化价值

中亚东干族虽然只有 120 年的历史(1877 年至今)，却拥有丰富多彩、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以及独具特色的民族诗歌。根据司庸之的观点，可将其分为两个阶段：传统诗歌阶段即 1877 年至 1917 年“十月革命”；新诗歌阶段即 1917 年“十月革命”至今。某种意义上来说，中亚东干族诗歌均由中国传统民歌过渡而来，不论内容还是形式都受中国清朝陕甘地区民间文化与民歌唱作的影响，透视出中国传统文化的潜在影响，尤以传统诗歌阶段为甚显现出重述传统文化的重要价值。

此期东干人属东干族的第一二代，第一代是 1862-1877 年反清被剿的幸存者，他们是传统诗歌的继承者、创作者、直接传播者；第二代生长于中亚环境，仍受传统民间文化、文学的熏陶，他们中有人也是传统诗歌的传唱者、创编者。首先，此期东干族诗歌内容受中国传统民歌的深刻影响，其中蕴含着历史故事、人情事理、风土习俗、天文地理等丰富内容，同时与传统诗歌“兴观群怨”说相符因而具有教化人、悟真谛、抒感情、言心志等重要功用。如《五哥放羊》：“三月里三月三，五哥放羊在南山，日落西山山腰腰转，咋不见五哥转回还”，作为情歌直白大胆地歌书着女子对心上人焦急的等待。伦理道德歌《五劝人心》则教育和告诉人们如何处理家庭父子、兄弟、妯娌关系，如何处理邻里关系，如何为人处事、持家过日子等生活哲理，既有中国以仁爱理性为核心的传统儒家文化之影响，又有伊斯兰教文化的本源作用。《珍珠倒卷帘》被称作“中国历史小百科全书”，唱词中有中国历史上的“水泊梁山”、孝子“王祥卧冰”、夫妻恩爱至死不渝的“孟姜女哭长城”“刘秀走南阳”“过五关斩六将”“白蛇传”“三英战吕布”“孙庞斗智”“打登州”“王宝钏守寒窑”“薛刚反唐”“下河东”“牛郎织女”“姜子牙钓鱼”“伍子胥过昭关”“霸王别姬”“薛仁贵征东”“火烧赤壁”等历史传说与民间故事。

怨刺诗的传统在东干族诗歌中也有显现，如《南巧担水》就是以东干族妇女视角和口吻进行写作，唱叹哀诉了女性悲惨命运及其根源，即封建伦理纲常对女性的残酷桎梏。《一对牛》悲切真实地展现了穷苦劳动人民泣血的生存之艰与生命之苦。儿歌也是其重要组成部分，因接受对象的特殊性，因而成为受传统民歌通俗性、口传性与教育性特质影响之集大成者：“我娃乖，穿新鞋；我娃不乖穿旧鞋。打锣锣，磨面面，我娃是个乖蛋蛋。……把娃撂到墙缝里，蝎子夹得要命呢；把娃撂到房上，老鸦叨的当当……”民间口语与俚语的融入使之富有乡土气息和摇篮曲调性，刻画母慈子孝动人场面的同时流露出浓郁的亲情和温情的母爱。

中亚东干族诗歌的传统文化价值不仅展现在内容的书写上，其生动鲜活的形式也是汲取传统文化义素的重要维度，呈现出传统文化与民间艺术的多样态面貌：中国陕甘宁地区的“花儿”、秦腔、歌谣、快板等均有显现。如《五劝人心》的形式极似秦腔干板“乱弹”，结构松散自由，风格疏朗自然，叙事说理结合并各自成段，且歌词古朴纯正，与今天陕甘农村口语或秦腔中唱词毫无二致。《南巧担水》：“一更推磨二更箩，别人睡觉我做活；早上担水浇菜地，晌午担水步难挪。婆婆骂我不争气，公公说我做不出活，小叔过来扇耳光，丈夫回来踹几脚。”全诗共8句，每句7字，形式整饬，首句和双句押韵的调式与中国西北地区回族“花儿”一致。此外还有《珍珠倒卷帘》，全诗共55行111句，每句7字，个别句8、9字不等。根据叙事情节先由第十二个月到正月，再由正月唱到第十二个月——是谓“倒卷帘”，全诗采用大结构且结构严整，整体押韵，而在讲述每个月时呈现为一个独立小结构，首句和双句押韵。全诗韵脚变化灵活，鲜明活泼。由此可见，东干族传统诗歌形式多样且不拘一格，极其生动灵活，与中国传统文化与民间文艺之广博密不可分。中国传统文化与民间艺术的表现形式十分丰富，仅流传陕甘的戏曲就不下十多种，因此第一代东干人移居中亚后，也把中国传统文化带到了中亚。1917年十月革命前的中亚东干人还没有书面文学的创作，但民间口头创作活动十分活跃。加之由于新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尚未出现，新的思维方式还未形成，中国传统儒家和伊斯兰教伦理道德、观念、价值取向、价值标准仍根深蒂固，制约甚至决定着东干人传唱或新编的诗歌从内容上和形式上都高度呈现出中国传统文化价值。

二、家园寻根价值

历史上的陕甘地区，是黄河文明的发祥地，是中国传统文化发祥地之一，也曾孕育了两汉辞赋、建安诗歌、唐诗等，中亚东干族的第一代人也曾生活、劳动在这里，不仅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浸润，而且对这片土地也具有深厚的情怀和无限的眷恋。因此，在东干族诗歌书写中，东干人的家园情怀和文化寻根意识总自觉或不自觉的流于笔尖。

东干族华人迁居中亚时，多聚居于不同的村庄里，这些聚居地不仅是其地理空间意义上的聚居地，更是其心灵归属的“唐人村”，是东干诗人反复书写的重要意象。被誉为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诗人”的亚瑟尔·十娃子就为村庄写了不少诗，如“人都说的：——哨葫芦/又脏，又攘！/谁都不去。站不住。/有多心慌！/可是我总不信服。/这个大乡/泛常揽络我的呢，/就像亲娘”（十娃子，《就像百灵儿我唱呢》（上）263）。诗中把东干人聚居的村庄比作亲娘，以母子情比喻自己对乡村家园的感情。吉尔吉斯斯坦东干族青年诗人伊斯哈儿·苏瓦佐维奇·十四儿也在诗中把乡村家园喻为母亲，“我的亲爱骚葫芦，/贵重老家，/……就像母亲路口儿上/四季等我”（十四儿26）。亚瑟尔·十娃子是东干书面文学创始人，十四儿是当下东干族的活跃诗人，他们都认为自己是乡村家园的儿子，可见挚爱中亚“唐人村”是东干诗人的共同心声。中国作为东干人先祖曾生活之地，也是东干文学中地理家园意识的归属地。与此同时，两人都在诗歌创作中关注到中国银川。“雪也落到头上哩，/我爷孽障。/眼扎毛上也落哩/一层毒霜。//心总不定。肯念割（念叨）：/——我的银川。/哈巴，还等我的呢，/老娘一般”（十娃子，《就像百灵儿我唱呢》（下）107）。诗人在诗题中把银川称为“我爷的城”（十娃子，《就像百灵儿我唱呢》（下）107），由此刻画出一位脚踏异国土

地，遥望中国家乡的老人形象，饱含浓郁的乡愁。依斯哈儿·苏瓦佐维奇·十四儿写银川的诗如：“再见！我的连心哥儿，/温存银川，/我的后辈的家乡，/前辈的盼……”（十四儿 52）诗人对银川同样具有家乡归属感与认同感，并将银川喻为“我的连心哥儿”。可见，同一座中国城市在不同东干诗人笔下是不同的。“我爷的城”，抒写东干先辈的中国家园情感，“我爷”与银川有“母子情”；“我的连心哥儿”，抒写诗人“我”的中国家园情感，我与银川有“兄弟情”。

东干人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是“族群传承型认同”，类似情感型认同，但相比后者又有较大差异；这种认同不是移民个体的选择，而是移民群体的召唤。这种认同让中国文化渗透在民族信仰中，认同带有一定的宗教化色彩，认同者的认同情感更强烈。具有族群传承型文化认同的东干诗人，将本民族放在民族融合大环境中进行歌书的同时，也慨叹人性之广阔博杂。东干诗人十四儿受西方文艺思潮影响，具有现代主义创作倾向，他对“回族”的书写耐人寻味。“老回回……快两千年/满世上你转的呢，/不知道闲。/哪塔儿/没你的脚踪？中国、苏联、/美国、法国、蒙古国、/英国……/往几时你/还回呢？心咋不定？/你的家在哪塔呢？/哪是鸿运？”（常文昌常立霓 258）诗中用“快两千年”在历史长河中反思东干人的家园意识和独特乡心，回族先祖从唐代迁居中国作“蕃客”到清末迁居中亚作东干族，期间就有近两千年历史。十四儿在诗歌中的叹息不仅是回族的家园问题，也隐喻人类的家园问题，正如诗中所写：回族的家园失落，人类的家园失落，家园永在途中。诗歌的深刻之处在于，由回族家园问题的思考，上升到了人类的家园问题。十四儿不具有世界性的开放视野，认同自己的民族文化，但他对家园问题的思考也同样抵达了颇有深度的文学空间。

三、即时性流变价值

20 世纪 30 年代，东干文字产生，东干人开始有了自己本民族的文字报刊，有了自己本民族的作家群体——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个时期的诗歌才叫东干族诗歌。50 年代以后，东干人对传统民族传唱少了，学校与乡庄教唱俄语歌曲，唱哈萨克民歌、吉尔吉斯民歌。到了 60-70 年代，演员多唱流行歌曲。由于其他民族文化的渗透，到了 90 年代，东干人十分重视传唱本民族传统歌曲。东干族新诗歌在民间口头创作基础上，在传统诗歌基础上的提高，保护和弘扬传统的同时具有多民族融合交流，甚至具有世界性成为世界文学一部分的现实意义。内容上更加贴近现实，通俗书写中少了传统诗歌的古典意味，多描述歌唱东干人的现实生活，也有对民族历史、对先辈故土的深情怀念。如诗人亚塞尔·什娃子歌唱东干族根据地营盘的一首诗《营盘》：“德国柏林广场上，我也浪过，它没有营盘的草场软和。我在罗马花园里，听交响乐，营盘田间的声音，不离耳朵”。如农民诗人大吴·索阿訇诺夫的歌颂东干族妇女的一首诗：“园子菜地活包了，从早到晚；各样蔬菜长成了，花的耀眼。缝纫机子放下了，袖子一挽；冬夏衣服停当了，比花都粲（好）”。

这两首诗是对现实的生活、现实的人进行写真、描述、歌唱，诗中叙述通俗（白描法）：“耀眼”“一挽”“停当”“粲”等用语仍然和今天陕甘农村的口语一样。如亚塞尔·什娃子《给陕西的信》中，寄托了东干人对“根”的怀念、眷恋：“我想睡在渭河边，脚手伸长；星星月亮和太阳，把我照上。在我心里总指望，不断来往；两边回汉兄弟们，地久天长”。如前述的《歌唱您·营盘》中的一段：“我把营盘来唱呢，出了名的马三成；民族之间团结紧，兄弟姊妹带文明。我把营盘来唱呢，五更里的亮明星；众人心里亮堂了，营盘乡庄好前程”。这是一首歌颂东干人追求和创造团结、进步、文明的诗。

东干诗歌形式越来越趋于简洁，且结构整齐划一，其形式大致可分为三种：第一种是“花儿式”；如 1978 年 11 月东干族隆重纪念营盘成立 100 周年，东干文化名人叶塞谱曲，兰阿洪诺夫作词的《歌唱你·营盘》：“我把营盘来唱呢，您是我的老母亲；走到天涯都想呢，您是我的半个心。我把营盘来唱呢，出了名的马三成；民族之间团结紧，兄弟姊妹带文明。”每句 7 个字，四句为一小段，每段首句重复，二、四句压韵的“花儿”形式的一种。第二种是“快板”式；如现在的营盘

乡庄中学东干文课本中有一首 50 年代一位农民诗人的诗歌：“俱乐部里真红火，里头杂样民族多，男女一满都做活，不分你我一起过。住的房子都亮火，不用煤油灯也着；拉吉窝(指收音机)不停把话说，都把福足光阴过。”东干族最著名的诗人及作家，东干族文化奠基者亚塞尔·什娃子 1956 年出版的《给陕西的信》的小册子中的这一段——“七·四”格式：“我爷陕西生下的，是个大省；它在世界各地，也有名声。关中有个西安呢，也叫西京；多少年前修下的，名人的功”。亚塞尔·什娃子 60 年代写的怀念屈原的诗也是“七·四”格式：“屈原老爷生长在，汨罗江上；你在楚国无常了，众人不忘。人们唱着你的曲，把你记想；听说你爱吃粽子，人们没忘”。亚塞尔·什娃子写的《唱银川》则是“九·四”格式：“雪花飘在我的头上，我也歌唱；虽然眼睫毛上结下了，一寸的霜。波浪起伏在心坎里，把银川唱；也许亲人们在等我哩，如儿想娘”。新渠乡庄农民诗人大吴·索阿旬诺夫写的一首歌颂东干妇女的诗是“七·四”格式：“我把姨妹想唱呢，实在俊美；回回中间生养了，鲜花喜色。各种饭菜都会做，时间不费，客连连夸奖呢，色香型味”。营盘乡庄文化名人，业余诗人黑牙·兰阿洪诺夫 90 年代写赠王国杰先生的一首诗也是“七·四”格式：“八月十五遇面呢，指望不定；说是路上走呢，翻过天山。都是陕西生下的，中国西安；我们盼望兄弟们，在老营盘”。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东干族新诗歌的这种“七·四”格式也写进了东干族学校的初中课本。有一首诗(课文)专讲东干人的饮茶习俗和礼仪：“天天早上起来了，各家各户；先喝茶呢不吃饭，也不吃肉。格鲁吉亚的太阳，库拉的浪；都在茶叶里头呢，血咋不旺”。总之，这个时期，不论是业余诗人，还是专业作家，不论是农民诗人，还是文化名人，他们的诗作以“七·四”格式或“九·四”格式、“花儿”式或“快板”式居多。甚至把“快板”式和“七·四”式也写进了学校的初中课本——可见这种形式的普及性、社会性和群众认同性。

以上这些形式的东干族新诗歌和前述的东干族传统诗歌形式有所不同，从复杂多样的民歌形式变为简洁整饬的现代形式，且后者并非与传统无关，其风格与音律仍与陕西民歌相似，只是在时间洪流中与民生相迎和产生了新的变化。“十月革命”后，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生产机械化逐步的实现，东干人生产、生活的节奏必须加快；加之东干族文化和其他民族及俄罗斯文化及思维方式的“碰撞”等，东干人势必对传统诗歌的形式要简化、改革，以便其更易为读者接受和记忆。

但是，东干族文化不能异化而必须保持民族特色，因此东干人在本民族与其他民族的交流融合中，逐渐淡化那种传统的“古典”形式，较多地采取了简洁、整齐划一的“七·四”格式、“九·四”格式和“花儿”形式及“快板”式。东干诗歌的创作生发出新的样貌与流变特征，其原因在于历史已经远去，她在东干族后代（特别是第三代之后）的记忆里逐渐成为模糊的代际传说，偶尔回味的同时更多的是直面生于斯、长于斯、生活劳动繁衍于斯的新现实。他们与现实共进退，创造现实的同时总结并且歌唱现实，寄托自己的情感。因此诗歌的内容必须联系现实和反映现实，显现出重要的即时性与现实性价值。

中亚东干诗歌作为“丝路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因特殊历史背景与当下流变现实具有独特地位。特殊的民族历史，特殊的民族经济、文化特征以及移居中亚后特殊的民族生存、发展空间，铸就了东干族诗歌的特殊价值。随着历史的进步，今天东干人面临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市场经济走向发达，民族融合加快，经济、文化、教育进一步开放的等，也许东干族诗歌(以及东干族文化)会出现新的动态，扩充丝绸之路文化与丝路文学内涵的同时，给我们提出值得研究的新问题。

参考文献:

- [1] 王国杰. 东干族形成发展史——中亚陕甘回族移民研究[M].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7.
- [2] 丁宏. 东干文化研究[M].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1999.